

血雨腥风育遗孤 和平岁月援宁夏 (三)

——马骏烈士夫人杨秀蓉来宁前后

拜学英



【响应号召来宁夏】

1958年，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和各行各业科技人员，尤其是回族干部响应中央号召，舍弃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离开家乡和亲人，从全国各地来到宁夏，支援新成立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在哈尔滨生活居住了10年的杨秀蓉来宁夏缘于：其一，党中央发出支援宁夏建设事业的号召；其二，刘格平的动员。渤海回民支队（回民支队二支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了战功，解放战争中曾一度打到东北，解放了牡丹江一带。东北解放后，改编为铁道兵二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结束后，因大部分战士是回民，中央军委铁道兵司令部命令将原渤海回民支队中的174名回民干部分两批调宁夏工作。曾担任渤海回民支队领导的刘格平早年在天津冀一带搞地下工作时，与马骏同是地下党，更是朋友，关系密切。1957年，刘格平主持筹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工作，1958年10月，刘格平当选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党委书记兼第一书记，代理第一书记。他动员东北回民支援宁夏的建设事业。受刘格平的动员，原本想按周总理意见迁居北京生活的杨秀蓉与儿子们商议，决定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58年，马骏的次子马德钟由哈尔滨调任宁夏人事局副局长，长子马德铸于1959年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奉调来银川在兰州铁路局银川分局工作。于是，杨秀蓉带领家人，从哈尔滨启程，经北京、包头于1958年11月30日到达银川，宁夏党政领导在火车站热情迎接。安排她们暂住在宁夏交际处，半个月后迁至太平巷，后又搬到新建的利群西街33号家属院居住到1963年底。后来，政府在老二所后建起了砖木结构家属院，杨秀蓉随次子马德钟住大院第一排西头，与马腾骞一家为邻。

【参政履职的老人】

1961年前后，党和国家重视革命烈士史料的征集工作，有关方面专门成立了马骏烈士史料征集小组和马骏烈士事迹考察组。时年66岁的杨秀蓉积极参与调查、收集马骏烈士的史料，她向征集组的同志满怀深情地回顾了与马骏相识相爱及支持丈夫从事革命工作的过程，回顾了丈夫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共产党人对理想信念坚定不移的追求以及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让征集组的同志深受教育。杨秀蓉不顾年老体弱与征集组的同志一道赴西安老家，通过走访座谈等形式广泛征集马骏烈士的英雄事迹。1961年，杨秀蓉率次子马德钟、女儿马德芳与征集组的工作人员到宁夏时受到马骏烈士的战友、中共吉林省委原第二书记于毅夫和夫人的接见。

杨秀蓉早年积极支持丈夫从事革命活动，冒着生命危险赴京营救狱中的丈夫，周总理、邓颖超称她为“伟大的女性”。来宁夏后，她以丈夫的事迹教育子女和周围的人，经常给银川各中小学作革命传统教育报告，并积极参政议政。1964年，她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年69岁的她于1964年1月赴京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百忙中的周总理亲切会见了满头银丝的杨秀蓉，并在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时，周总理派秘书告诉杨秀蓉散会后先别

走，杨秀蓉在总理秘书的引领下，走向主席台与周总理见面。随后，周总理又把杨秀蓉分别介绍给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当与刘少奇握手时，刘少奇含着泪花说：“大姐，马骏当年从上海走天津时，我与恩来送的他。”吃饭时，周总理又专程来到宁夏看望杨秀蓉，嘱咐宁夏的同志，要关心照顾好革命烈士的家属。会议间隙，同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邓颖超与杨秀蓉手挽手亲热合影留念。这些照片作为珍贵资料，收进了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马骏画册中。

上世纪60年代，杨秀蓉当选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银川市人大代表；1964年9月25日，宁夏政协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银川举行，杨秀蓉作为特邀界别的委员参会；在1977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三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杨秀蓉作为特邀界别委员参会，并当选为自治区政协常委，满头的银丝的她双手握着选票，庄严的投进票箱，履行着一名政协委员的职责。她的次子马德钟在此次会议上当选为政协秘书长。杨秀蓉不论当选为自治区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还是自治区政协常委，都积极参与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反映百姓心声，呼吁全社会重视对革命烈士英雄事迹的征集

与学习，鼓励人们继承先烈的未竟事业，以先烈为榜样，做好各自的工作，加强民族团结，共谋宁夏发展。马骏烈士就义35周年之际，杨秀蓉在1963年2月15日《宁夏日报》纪念马骏同志光荣牺牲35周年专版上发表了《悼念马骏烈士逝世35周年》一文，深切回忆、缅怀了马骏为信仰、为真理英勇奋斗的短暂一生，结尾一段写道：“回忆马骏烈士生平，对比我们一家解放前后的生活，我衷心的感谢共产党，感谢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将更好的勉励我的儿孙们，努力继承马骏烈士和其他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全部智慧和力量”。

每遇选举各级人大代表，居委会的同志考虑到她年事已高，来会场多有不便，就把票箱拿到家里。杨秀蓉投票时，非常重视，总是认真填写选票，庄重地投下自己的一票。多年来，杨秀蓉不顾年迈体弱，常到驻宁部队、中小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为工人、农民、干部、解放军、青少年作报告讲解马骏烈士的事迹。每当到小学作报告时，学生们给她戴上的红领巾中总在回家后被孙子们抢着要去戴在各自的脖子上。每当节假日时，附近的学生、干部、解放军战士就会来家里听她讲革命战争年代的故事，还帮她清扫院子、擦玻璃等。



▲马骏烈士夫人、三届自治区政协常委杨秀蓉(右二)投票选举政协领导人。

作者简介 拜学英，中国作协会员，宁夏文史馆研究员，现供职于宁夏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拾遗

鲁迅买书

一天，鲁迅家里来了一位陌生的文学青年，自称非常崇拜鲁迅，提出想从他这里借一些书。鲁迅问他想借什么书，青年说只要是文学方面的都可以。

鲁迅略微沉吟了一会儿，没有给那位文学青年借书，却邀请他去了附近的一家书店。书店老板和鲁迅是老朋友，得知情况后，就向那位青年推荐了一些文学名著。

鲁迅留下青年选书，自己要忙别的事，就向书店老板交代了几句话，先走了。

文学青年因囊中羞涩，买不起那些文学名著，只犹犹豫豫地选了最便宜的一本书。

书店老板告诉青年，尽管选自己喜欢的书，有人会替他买单。青年明白了鲁迅的善意，不好意思起来。书店老板又告诉那位青年，不要推却，因为鲁迅经常这样做。

最后，那位文学青年怀着对鲁迅的敬意和感激满载而去。（据《人民政协报》）

刘文典上课不拘常规

刘文典按时下课的次数少之又少。文章解读没讲完，他就不下课，必须要讲完自己得意的思想，才能下课。这样的“拖堂”习惯，却颇受学生欢迎。毕竟在学生看来，能够多学习一些知识，受大老师熏陶，实在不是几分钟的事情。

刘文典上课不拘常规且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道文章精义。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点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五月十五，他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据《天津日报》）

凡·高酷爱读书

著名的艺术家文森特·凡·高还有另一项隐秘的激情：一生都在如饥似渴地阅读。他读的不单是小说，还从专著、传记、博物馆指南里了解艺术作品，更不会错过最新的文艺期刊。

在《凡·高的书》中，玛丽拉·古佐尼探究了凡·高的书虫生活，留意他读过什么，写过什么，以及他对阅读的热情如何影响了他的艺术。从凡·高刚成年时的宗教抱负，到决心成为一名画家，再到他悲剧性地终结自己年轻的生命。他从荷兰搬到巴黎，又搬到普罗旺斯……从中可以看到激发他的是哪些艺术家和作家。

凡·高在给弟弟的信中大谈自己所读，提到至少200位作家。他还常常让书籍和读书的人入画，如《静物与圣经》和《阿尔勒城的基诺夫人》等。凡·高最喜爱的作家有：托马斯·肯皮斯、夏尔·布朗、巴尔扎克、龚古尔兄弟、莫泊桑、狄更斯、埃克曼·夏特里安、荷马、维克多·雨果、皮埃尔·洛蒂、儒勒·米什莱、莎士比亚、哈里特·比彻·斯托、左拉等。（据《天津日报》）

红色百宝

这是一支派克钢笔，质地为赛璐珞，长13.5厘米。

这支看似不太起眼的钢笔，是国家一级文物，曾在中国革命史上书写下不平凡的一笔。

这支派克钢笔收藏在平津战役纪念馆，它的主人就是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苏静。

“平津战役期间，苏静就是用这支钢笔做谈判记录，整理谈判纪要，起草和平协议。”平津战役纪念馆宣教部主任祁雅楠说。

一支钢笔，见证北平新生

平津战役是三大战役中最后一个战役，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华北军区部队、地方部队百万余人，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张家口500余公里的战线上，与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展开战略性决战。

1948年12月，在人民解放军强大军事压力、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策动与争取、北平广大群众各界进步人士强烈要求与敦促下，傅作义派崔载之等人秘密出城谈判。苏静负责接待了他们，但双方条件相差甚远，谈判无果。

随后，人民解放军迅速解决新保安、张家口之敌，傅作义迫于形势压力，于1949年1月6日派周北峰为代表赴蓟县八里庄进行第二次谈判。这次谈判形成了会谈纪要，但是傅作义仍存幻想。

1月13日，傅作义派邓宝珊和周北峰作为全权代表，来到河北省通县西五里桥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第三次谈判。

1月15日，人民解放军只用29个小时解放天津。

“天津解放，使北平守军陷入绝境，傅作义彻底失去了谈判筹码。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放弃了讨价还价的最后幻想。”祁雅楠说。

1月16日，双方签署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基本协议。

傅作义希望人民解放军派出代表进城，以便进一步协商联络，平津前线首长当

即决定苏静为代表，随同邓宝珊一同进城。

1月18日，傅作义同王克俊、阎又文，在崔载之陪同下，来到苏静下榻处表示欢迎。

寒暄之后，傅作义提议，依据城外达成的初步协议，“再商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和平解决的具体方案。”

1月19日，苏静与王克俊、崔载之、阎又文等人根据此前的初步协议开展磋商，提出一条，研究一条，意见一致后就写上一条，使协议逐条具体化。草稿拟定后，苏静电告平津前委，转报中央军委，修改后返回来，遂成正式协议，即《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协议的基本精神是：迅速结束战争，使人民渴望已久的和平得以实现，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化古迹，使国家和人民的物质财富不受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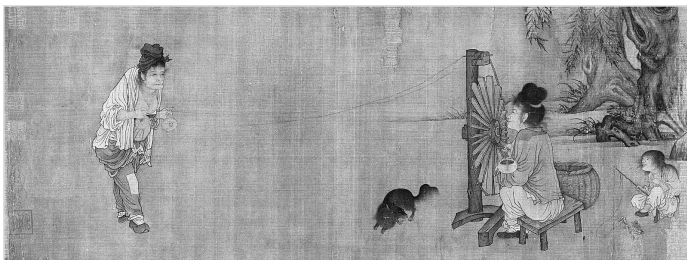
1949年1月21日，苏静代表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在《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上签字，北平和平谈判就此画上圆满句号。

1995年11月9日，在平津战役纪念馆筹建过程中，苏静将这支钢笔捐赠给纪念馆。

风霜雨雪70余载。这支钢笔并没有因岁月侵蚀而黯淡，依然绽放着光彩。“每当驻足凝视这支钢笔，就会让人想到中国共产党人为和平解放北平、保护古都和人民的不懈努力，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渝初心。”祁雅楠说。（据新华社）

古人日常曾这样唤母亲：

“姐”“社”“家家”……



怎么称呼自己的母亲？现代人对母亲的称呼无非几种：小时候叫母亲为“妈妈”“妈咪”，长大了就喊“妈”“娘”“老妈”等等。但在古代，人们对母亲的称呼就没这么简单了，光是口头语就有二三十种，书面语也有若干种，有些称呼甚至令人匪夷所思。下面按历史顺序略略梳理一下。

◀《纺车图》王居正(宋)。

先秦：母、妣、萱堂

先秦时期，“母氏”和“母”，均表示母亲。如《诗经·邶风·凯风》：“有子七人，母氏劳苦。”《诗经·小雅·蓼莪》：“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妣”也用来称呼母亲。《尔雅·释亲》云：“父为考，母为妣。”在《仓颉篇》中也有“考妣延年”之说，意为祝福父母健康长寿。但大多数时候，“妣”表示已故的母亲。

“萱堂”代表母亲，出自《诗经·卫风·伯兮》：“焉得萱草，言树之背。”萱草即忘忧草，“背”指北堂，为母亲的居所。古时当游子要远行时，就会在北堂种萱草，希望能减轻母亲对孩子的思念，忘却忧愁。萱堂、北堂，均代表母亲。

两汉：社、姐

到了汉代，“母”字多用于书面语，口语中通常叫母亲为“社”或“姐”。高诱记载：“江淮人谓母为社也。”称汉代时呼母为“社”，主要是江淮一带的人。

对母亲更奇诡的称呼是“姐”。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姐，蜀谓母曰姐。”意思是，古代蜀地人称母亲为“姐”。其实，不仅四川一带的人呼母为“姐”，其他地方也有这种习俗。

南北朝：家家、阿家

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纷纷进

入中原地区，民族的大融合也带来了习俗的融合。此时对母亲的流行称呼，是“家家”“阿家”。据《北史》记载，北齐南阳王高澄和他的兄弟们都叫父亲为“兄兄”，叫母亲为“家家”。

隋唐：娘、媪

“娘”字古作“娘”。西汉时，人们称年轻的寡妇为“娘”。到隋唐，“娘”才正式成为母亲的代称。据《隋书·韦世康传》记载：“况娘春秋已高，温清宜奉，晨昏有阙，罪在我躬。”这里的“娘”就是指母亲。

隋唐时常合称父母为“耶娘”。如杜甫《兵车行》：“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还有人称母亲为“媪”。如《广雅·释亲》云：“媪，母也。”

宋元：“妈”普遍成为母亲的口语化称呼

虽然人出生后最早发出的音是“ma”，但“妈”字却比较晚才出现。“妈”代表母亲，也是三国以后的事（《广雅·释亲》云“妈，母也。”），双音节“妈妈”的出现就更晚了。

直到宋元之后，“妈”和“妈妈”才普遍成为对母亲的口语化称呼。

另外，“妈妈”还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如宋汪应辰《祭女四娘子文》：“维年月日，爹爹妈妈以清酌、时果、庶羞之奠，祭于小娘子之灵。”

但“妈妈”在宋元时期还有其他含义。如元人俞琰《席上腐谈》云：“今人称妇人为妈妈。”凡已婚妇女或年老的妇女，皆可称为“妈妈”。彼时人们还称老年女仆为“妈妈”。

明清以后，“妈”“妈妈”“娘”“娘亲”等成为对母亲最普遍的称呼，古代那些五花八门的叫法，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据《广州日报》）



《孟母断杼教子图》康燕(清)。